

8月17日,留美作家张北海在纽约去世,享年86岁。

他祖籍山西五台,1936年生于北京,1949年随家人移居台湾,曾师从叶嘉莹学习中文,后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1962年到洛杉矶继续深造,1972年因工作迁往纽约。著有《侠隐》《一瓢纽约》等。

侄女张艾嘉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嬉皮士”;作家阿城为其风度着迷;画家陈丹青说自己看了张北海的文章才懂得纽约;导演姜文则把他的小说《侠隐》搬上大银幕,成为“北洋三部曲”的终结篇。

他曾借《侠隐》主人公之口讲述了自己的人生观——相聚一场,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文艺什么都好,就是没出息”

我给儿子取名张南山,后来就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张北海。我的本名叫张文艺。当时还被父亲训了一顿,说文艺你把老规矩全忘了,一下子跟你儿子同辈了。父亲看儿子真的很准,我念中学的时候,父亲就跟我母亲讲,文艺什么都好,就是没出息。他眼中有出息的样子应该是,孩子理想要做工程师、做律师、做医生,但我完全没有。

从美国南加州大学念完比较文学的硕士后,我从没有想过去做一份正式的白领工作,一直在打零工。各种工作都做过,而且几乎都是卖劳力的。每份工作短则一年,长则一年半到两年。实际上打工从在台湾念书时就开始了。加油站、电台、银行、花店,都做过。

北平、台湾、美国

我1936年出生于北平,童年时期遇到抗战,从北平逃到天津租界,又逃到重庆大后方。《侠隐》里蓝青峰的原型就是我父亲,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任天津电话局局长,他和张自忠交情很好,曾协助张自忠从平津沦陷区逃往大后方。

小说里的蓝家就是我们家,在东四大街九条30号的四合院。虽然我的家庭经济条件各方面还不错,但终究也是难民对不对?光是那个心态已经不太好受了,因为处处要戒备。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又接踵而至,我们全家又逃到台湾。

台湾当时的社会,是个人独裁的时代,那种压力很大。

1960年代,我从台湾到了美国,不光是震惊了,那简直就是禅宗的当头棒喝。在加州生活的那十几年,就是整个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性解放……那个冲击太大了。

那时候很多中国的传统家庭,吃饭时还是老婆在后面伺候,

在联合国做翻译

1971年,联合国语文司中文处需要扩大规模,开始在全球招聘翻译。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原来的台湾代表团成员多数都留过学,英文说不定比中文还好,基本上不需要中文翻译,所以中文处原先的规模很小。

当时一个朋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说,张文艺啊,你怎么还每天开卡车送货呢,你找个正经工作吧。这份工作对我的吸引力很简单:联合国的待遇非常好,从此我经济上不用愁了。

当时有大概一万人报名,一批批刷下来,最后取了七八十人,

那时候我和太太的工资加起来刚好够我们的开销,当然要稍微节省一点了,但也不至于挨饿挨冻。虽然累,但我喜欢打零工。因为自由。你一旦找一个正经工作,那就是白领阶层,连衣着都要改变。我很少穿西装,喜欢牛仔褲、帆布球鞋,永远都是这个德行。而且我不想像一艘抛锚的船,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我又不知道我这艘船应该开到哪里,所以我先每个港口停一停,每个地方跑一跑。

按道理说,早就应该为将来考虑甚至紧张了,可是我完全没有。而且对我来讲,别人怎么看我,I don't care。这是我天生的性格。所以我父亲又讲,虽然文艺没出息,可是他是有福之人。



很少坐下来一起吃。从那样的一个环境一下子到了这样的环境,能不震惊吗?第一个暑假,我看到社区广场上摆了很多桌子,上面写着Freedom Riders,问朋友才知道,因为黑人投票率低,他们就召集一批志愿者坐着巴士去鼓励黑人投票,参与竞选。他们是为自己而坐这个巴士的,所以叫Freedom Riders。这种种文化的、政治的现象让我震惊。

我也在其中。我1972年到纽约联合国就职,从此就在纽约扎下根来。我1962年到美国,之前在洛杉矶。到了纽约,办各种入职手续,这是我第一次有份正经的工作,也是我第一次有个安稳的生活。也就是说,一直到差不多40岁,我的生活才真正安定下来。

1975年,我申请到肯尼亚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作了3年。存了1万美金,回来贷款买了房子。我在联合国语文司中文处工作,工作内容就是为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做翻译服务,都是笔译。比如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开了会,形成了一份决议草案,明天还要就

相聚一场,曲终人散

留美作家张北海自述



张北海在纽约

这份草案继续讨论,那你就要在天亮之前翻译好给他们。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轮流值夜

班,临时加班的情况也不少,尤其在冷战期间,加班很频繁。

在联合国我做了24年,这

作家之路

年代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嘛,由头就是说我跟那些不良分子混在一起——美国的左派还有黑人民权分子。其实我就是去听听演讲,他们的活动我都参加得很少,每个校园都有一个小队,就这么一点点的事情就被人打小报告回台湾了。这么多年,我拿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写作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刚好缓冲了我在联合国的官僚机构工作的枯燥一面。它对我很重要,占了我退休前生活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但我从没有把写作看得那么崇高,对我来讲,我就是跟我的朋友讲了个故事,仅此而已。如果你看了喜欢,很好;不喜欢,那看别的书就完了,没什么了不起。

我写《侠隐》也是如此。1995年,我得了盲肠炎,在医院里住了9天。我在病床上就想,明年就要退休了,干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喜

叶嘉莹的学生

中学做了几年国文老师,3年后随丈夫迁居台湾。当时她的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坐了几年牢刚刚释放,她自己 also 坐过牢,没有工作,生活相当困苦。

教了我一年后,我父亲问怎么付钱,叶老师说一毛钱都不收,这是帮朋友的一个忙。我父亲就托当时在航空公司做总经理的朋友从香港弄了一个电冰箱送给叶老师,让她省去每天去买菜的辛苦。

重新当学生

课,每门课上3个月。天气好的时候我就走路去,大概15到20分钟的路程。上完课10点钟,就坐车回家了。

最近几年没去选课了,现在我平时很少出门,主要的生活就是在家看书写作。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很少跟外界发生什么关系。其实过日子本来就很简单的,不需要多少钱就可以过日子。

我并非不赋予人生任何意义。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是你

24年里我从来没想过跳槽。还有什么工作这么适合我?如此安定,收入又那么好。上班的时间有弹性,做完8小时你就可以走;如果当天的工作你提前做完的话,可以做一点自个儿的事儿。

当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规范。在这规范里面,你可以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那时有家室有小孩了,你也知道不能够完全顾自己,你要有一个责任感了。年轻的时候不太愿意接受现实嘛,人到中年接受现实了。这种转变是非常自然的。《侠隐》中的李天然也还有那么多事没做成,他也只能接受。



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水浒传》……我就决定写武侠小说。我先做了两年研究,然后开始写,写到2000年。

我的书卖得并不多,台湾大概两三千本,大陆可能是一万本,只有一本书再版。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能够有相当固定的几千人看,已经不错了。

她按照中国的老规矩教,先背,背完了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给我解释,在这之前,什么问题都不要问。一年多以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管你念哪一句,我可以从那一句一直背背背,背到结尾,再往回背到这一句的前一句。课上最后十几分钟,她会讲一点点诗词,等于是调剂一下。当时我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国文老师,没想到她后来是中文世界古典诗词领域的大师。

能做想做的事,直到临死,没有懊悔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我以往所经历的,打零工我高兴,进联合国我也高兴,写作我也高兴,交朋友我也高兴。我这一生相当满足了。

《侠隐》里蓝蓝问李天然,她说人生难道就是这样,相聚一场,欢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李天然说,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刘磊整理,来源于《人物》杂志)